

西北史地丛书

冯承钧西北史地著译集

蒙 哥

【法】伯希和 等著
冯承钧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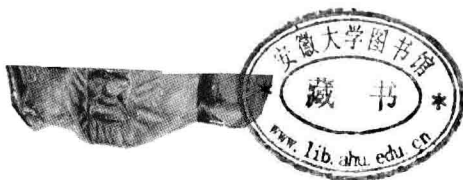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冯承钧西北史地著译集

蒙 哥

【法】伯希和 等著
冯承钧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蒙哥 / (法) 伯希和等著; 冯承钧译.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4

(西北史地丛书)

ISBN 978-7-5078-3604-2

I. ①蒙… II. ①伯… ②冯…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蒙古时期 IV. ①K24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39866号

蒙哥

著者	[法] 伯希和等
译者	冯承钧
责任编辑	张淑卫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社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130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13年4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4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604-2 / C · 207
定 价	29.80 元

CRI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出版说明

冯承钧先生（1887—1946），字子衡，湖北汉口人，是活跃于民国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中外交通史家。冯氏早年曾留学比利时，后入法国巴黎大学，主修法律。1911年获索邦大学法学士学位，续入法兰西学院，师从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冯氏归国后，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学府。冯氏通晓多种语言，如法文、英文、比利时文、梵文、蒙古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古回鹘语和吐火罗文等，并精通中国古籍，为其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历史语言学和考古学等方面的研究奠定了深厚基础。

20世纪上半叶，冯氏陆续翻译了近代法国汉学家的众多名作，如沙畹《大月氏都城考》、《〈魏略·西戎传〉笺注》，烈维《西突厥史料》，伯希和《中亚史地丛考》、《支那名称之起源》，布哇《帖木儿帝国》，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内容涉及了民族、语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艺术等多个方面。这些文章中，不仅利用了我国大量的史籍文献，还包括了不少外国文献资料和一些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冯氏涉猎广泛，在中国边疆史、中西交通史及元史研究方面都具有很高的造诣，著有《中国南洋交通史》、《成吉思汗传》、《唐代华化蕃胡考》、《再说龟兹百姓》等。

如今，冯先生已故去多年，其诸多译作及著述在市场上已不多见，但他在中外交通史上的贡献却不可磨灭。为了繁荣中华文化及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我社推出了这套《冯承钧西北史地著译集》（5卷）。编辑过程中，我们以上世纪中叶之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的版本为基础，选取冯先生著作中涉及西北历史地理的若干篇，其中包括了《大月氏都城考》、《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四天子说》、《帖木儿帝国》等诸多名篇，并因时代及地域顺序作了重新调整，以期满足读者的需求。

另外，由于原作翻译年代较早，很多专用词译法与当代有别，为尊重原作者首译之功，均未作改动。

特此说明。

目 录

蒙 哥 /1

荨麻林 /7

莎儿合黑塔泥 /16

四天子说 /26

评长春真人西游记译文 /39

元秘史旧蒙文中之一段讹误 /45

《蒙古侵略时代之土耳其斯坦》评注 /49

附录 阔阔迭卜帖儿及户口青册 /77

吐谷浑为蒙古语系人种说 /79

突厥语与蒙古语中之驿站 /82

高丽史中之蒙古语 /85

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 /94

蒙 哥

见《亚洲报》1913 年刊上册 451 至 461 页

伯希和 撰

1251 年至 1259 年的大汗，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也就是他的第三个嗣位的人。鲁不鲁乞（Guillaume de Rubrouck）在 1254 年居留哈刺和林（Karakorum）之时，曾名此汗曰 Mangu。1246 年普兰迦儿宾（Jean de Plan Carpin）也有记录，将此汗名写作 Mengu。蒙古史家撒难薛禅（Sanang Setsen）在《蒙古源流》中写作 Müngkä（或 Möngkä）。伊斯兰教的著作家则有术外尼（Juwaini）的 Mangu，同刺失德丁（Rachid ed-Din）的 Mungka，^① 两种写法。中国载籍的旧译名则作蒙哥。^② 布洛赛（Blochet）在他的《蒙古史绪言》（270 页中）见此两种写法之互用，以为：“在 13 世纪末年时，韵母同声母的调和虽然业经开始感觉有之，可是尚未存在。”这种结论与前提不合，而且对于我们现在所研究的问题毫无了解。我以为如果就此 Mangu 或 Mungka 名称的本意上考究去，其解说实在是很简单。

多桑（d'Ohsson）在他的《蒙古史》（第 2 册 333 页）说到蒙哥

① 阿剌伯（arabe）语字母只能使人知道韵母的性质，可未能详其音调。如此看来，Mangu 也可以作 Mängü。至若 Mungka，也可以作 Möngkä 或 Müngkä。我对于此点后别有说明。

② 案照蒙古时代惯用的译写方法，“蒙”字代表的对音是 muñ 或 moñ，“哥”字代表的对音是 ka 或 kā，抑是 ga 或 gā。

(Mangou) 豪施重赏时, 附注有云: “蒙哥在蒙古语中犹言银。同一名称在突厥语中则训作长生。蒙古人亦作同一之训, 可是从未用作人名。” 其实在蒙古“文”中, 蒙古语训作银的字是 münggü 或 münggün (无论如何在第一缀音中用唇舌韵母), 而不是 mangou。如此看来, 在这个未来的大汗初生之时, 或幼年时, 就预先给他一个后来表示豪施重赏的名称, 实不可解。至若古突厥语训为长生之字固是 mängü (斡儿寒 Orkhon 河碑文上作 bängü 同 mängü), 可是 13 世纪蒙古语相对的写法, 必是 mōnka, 在蒙古文中必是 müngkā 或 möngkā。^① 至若说这个长生之名不能用作人名, 可以《元史》作答: 《元史》卷三《宪宗本纪》说, 成吉思汗这个孙儿诞生之时, “知天象者言后必大贵, 故以蒙哥为名。” 注云: “蒙哥, 华言长生也。”

如此看来, 第四个大汗名称之意义, 显然就是“长生”, 而两种写法由是可解。当时的皇朝固是蒙古皇朝, 可是他的左右的人大部

① Mängü 是突厥语正例的写法, 完全已有证明, 与古突厥语声韵调合规律皆合。这种在蒙古文中所见到的调合, 曾经 19 世纪欧洲的蒙古语学家, 作有系统之适用。可是对于此说, 或者要加入若干变例, 近代蒙古方言之研究, 曾使我们芬兰同俄国的同僚 Ramstedt、Rudnev 等诸人, 对于史密德 (Schmidt) 同继续他的学说的人所持之说之绝对价值, 发生怀疑的态度。我以为研究古籍文, 好像也可止于同一态度, 我们所有使我们能够断言蒙古语的写法自 1600 年以来未曾变更的蒙古文件, 为数很少。我们字典中所用的, 皆是这个现代或现代化的蒙古文。在 17 世纪时, 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字, 在《蒙古源流》中所用的韵母是 ü 或 ö。史密德曾读作 möngkā。又若 Kovalevskii 的字典, 则写作 müngkā。第若将 R. Bonaparte 所刊布的《蒙古时代文件》检查, 将 1289 年阿鲁浑 (Arghun) 所致法国国王 Philippe leBel 的蒙古语国书参考一下, 就可见蒙古语业已知有湿音写法。因为其中若“绘画”一字写作 körük。“馈赠”一字写作 ögčü。可是第一个字即是训为“长生”的字, 未用湿音, 而写作 mongka (mongkā) 或 mungka (müngkā), 大约是后来诸刊行人将此字作为一种毫无理由的近代化了。我从甘肃携归 1362 年的汉、蒙文合璧大碑, 也知有湿音化的唇舌韵母。比方“儿子”一字写作 köbägün, 就是一例。可是此碑中的“长生”一字, 亦无湿音, 同 1289 年西方蒙古国的国书写法一样。复次我们对于确定十三四世纪的蒙古语读音方面, 还有一种最可宝贵的材料, 可是迄今尚未见有人大为利用, 这就是八思巴 (phags-pa) 字母写的蒙古碑文。若是详细研究这些碑文, 将可见 1269 年所制的字母, 同用婆罗门字 (brahmi) 译写的突厥语很相近。这类的突厥语写法, 曾经 Stöner 博士刊布了若干式样, 我在敦煌洞中也发现了一件标本。这种八思巴字母在蒙古语中将 o 与 ö 同 u 与 ü 皆予判别,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韵母, 其音在 u 与 o 之间。在这个训为长生的蒙古字中, 用以译写唇音韵母的, 就是这个字母 (可参考 Pauthier Marco Polo, p. 772 所转录的 1314 年八思巴字母碑文), 而且第二缀音未用湿音 (八思巴字母对于一切缀音皆用湿音之 a), 可是仅仅含有本于印度缀音附着于未用何种音符变更的一切声母之 a。如此看来, 好像在 1300 年前后, 至少在《汗廷方言》中, 训为长生的蒙古字, 应读若 mōnka, 可参考 Grünwedel 撰《佛教神话》56 页。

分是突厥种。同一字在两种语言中原始训为“长生”者，曾变成稍微不同的两种写法，可是极其相近，可以使人想到此两种写法的原始共同点。^① 由是突厥人名此大汗曰 Mängü，蒙古人名此大汗曰 Mönka (Möngkä)。普兰迦儿宾同鲁不鲁乞所译写的是突厥写法，汉译的蒙哥就是蒙古语写法的对音，伊斯兰教的撰述则两种写法并知有之。^②

中国史文似可供给与此 Mönka 或 Mängü 汗名两种写法并著的一个相类的例子。敦煌有 1349 年碑，上勒西宁王速来蛮 (Sulaimān?) 同他的几个家属养阿沙、速丹沙 (Sultān-šāh?)、阿速歹 (Asutai) 的名称。别有一碑年号在此碑两年以后，表示此养阿沙业已袭为西宁王了。沙畹 (Chavannes) 曾将此种碑文译出，^③ 并曾考订这个西宁王速来蛮，就是《元史》卷一〇八诸王表中 1329 年受封的西宁王速来蛮。同一人在《元史》卷一〇七《宗室世系表》中则作西宁王捌鲁蛮，说是成吉思汗一个兄弟的后人。《元史》卷三十六本纪 1332 年下，曾说西宁王速来蛮镇御有劳。至若养阿沙，沙畹并考订应是《元史》卷四三本纪 1353 年下之西宁王牙罕沙。

① 《蒙古源流》好像还有证明 mängü-mönka 相等之一例。他说有生于碎叶城 (Toqmaq) 的两弟兄，一人名唤 Aq-mö-ngkä，一人名唤 Yakhši-möngkä (史密德本 164 页)。碎叶城是突厥语言的区域，好像这个蒙古语的故事，散布及于花剌子模 (Khwarizm) 全国。此二名称之前半 (äq 猜言白，yakhši 犹言好)，纯是突厥语。好像《蒙古源流》或是他所本的蒙古化的本源，曾以为在后半见有一个蒙古语的相当对称，所以有此写法。此二名原来应皆写作 Aq-män-gü 同 Yakhši-mängü。古突厥名称用 mängü 的，并非无例可引，比方 von Le Coq 所撰的《高昌突厥语摩尼考》第一篇 30 页，著录有一 Arslan-mängü。《元史》卷三十五著录有一个甘州人，同此人同名，汉译作“阿儿思兰免古”，蒙古语也有相当的构成。就在《蒙古源流》之中，也有“拔都蒙哥” (Batu-möngkä) 或“伯颜蒙哥” (Bayan-möngkä) 等名称的结构。布洛赛在他的《刺失德丁·蒙古史》本文第二册 576 页，同附录 23 页中，曾说 Allah-dād “就是突厥名 monkhé-birdi 的阿剌伯语 (此误，应改作波斯语) 译名”。布洛赛两次用畏吾儿 (Oïgour) 字写此名称，可未说明去处，好像写得不对。因为突厥语的写法常作 mängü (偶作 mängigü)，不作 mönka 或 möngkä。实在此名突厥语的正式写法作 Mängü-birdi，知道的人不少。比方 Nasawi 所撰的同 Houdas 所译的《花剌子模算端札丁 (Jalāl-ud-Dīn Mangubirti) 传》，即有此名在内。《蒙古源流》好像将此王名分作两半，而变作 Jalildunsul-ta 同 Mängükilik-sulta 两个名称 (史密德本 84 至 87 页)。

② 参照 1829 年史密德本《蒙古源流》394 页，对于此点已有的说明。

③ 参考沙畹译《中亚之十碑》288 至 295 页。

我们对于这些考证，还可增加一点。《元史》是 1369 年所修的，可是其中的世系表，已在三年前见于 1366 年成书的《辍耕录》卷一之内。其中有些共同错误点，证明此二书所本之源皆同。《辍耕录》之西宁王名撒鲁蛮，《元史》之捌鲁蛮得为此名之笔误。^①

因为两书皆以此人之子是卯罕大王，我以为“卯”字似是“牙”字之讹（或者由等如耶字的邪字转讹而来的），其原名应是牙罕，顾两书之讹皆同，具见两书所本之文已有此误。而且除沙畹所检出的《元史》关于牙罕沙之文以外，《元史·本纪》别有两段著录此王之名。一在卷四二，1352 年下作宁王牙安沙，一在卷四三，1353 年下沙畹所检出之文后数行，则作西宁王牙罕沙。

然则一方面的“养阿沙”，又一方面的“牙罕沙”同“牙安沙”，应该比附何名呢？首先我们应该将沙字除开，因为此字似是波斯语 *šāh* 的译音，此言王也。我在前面曾将养阿沙一个兄弟速丹沙的名称，假定还原作 *Sultān-šāh*，此名在中亚人名之中业见有过。此外《元史》卷四十三《本纪》，1354 年下有个“鲁王马某沙”。此人的原名好像只能读作 *Maḥmūd-šāh*，看这个速丹沙的原名，其人应是一个伊斯兰教徒，所以我将速丹沙父亲速来蛮的原名考订是 *Sulaimān*，将来或有人非难，以为 1349 年同 1351 年的碑文所志的，是施舍佛寺的事情，不能说这些人是伊斯兰教徒。殊不知蒙古时代中国的伊斯兰教徒曾采一种很自由的折衷主义。此事不无他例可引，比方重修安徽一佛寺的碑文，上泐人名谓纳速刺丁 (*Naṣr ud-dīn*)，其人为伊

① 案捌字古读与朔字同，然而蒙古时代的译写，证明在十三四世纪时，此字在中国北方已不读作唇音了。比方《元史》卷一《本纪》1222 年下之“捌捌兰” (*Joqjarān* 参考 Bretschneider 撰《中世纪考证》第一册 286 页)，《辍耕录》卷一中之“捌只哈撒儿” (*Joci-khasar* 《元史》卷一〇七世系表脱撒字)，《元史》卷九九的“捌思吉斡节儿八哈失” (其对音应是西藏、蒙古语名 *Čhoskyi-vajir-bakhši*)，皆可为证。好像此捌字在同一时代不能代表“速来蛮”或“撒鲁蛮”第一字之发声，所以我以为《元史》转录《辍耕录》之文有误。

伊斯兰教徒无疑。^① 此外《辍耕录》同《元史》之卯罕大王的名称，既然考订其有讹写，尤足使我们之考订将“养阿沙”或“牙罕沙”之沙字屏除于考订之外，只去求“养阿”或“牙罕”的对称，我这一说我敢自信不错。

剩下来的“养阿”或“牙罕”，可以假定其原名是 yanga，同我们熟知的畏吾儿人塔塔统阿一名中的译法一样。此名后半之“统阿”，可以假定是突厥语之 tonga，此言“英雄”。顾考中亚诸史文，其中即有此 yanga 一字，其意犹言“象”。又一方面“牙罕”同“牙安”在蒙古时代，就是蒙古语 yaghan 的对译。而蒙古语中确有 yaghan (jaghan) 一字，亦训为“象”。^② 如此看来，此“养阿沙”同“牙罕沙”，应该还原作 Yanga-šāh 同 Yaghan-šāh。在此处如同在成吉思汗的孙儿名称之中，例子一样，皆是一个原始意义相同的字，

① 关于此碑文者，可参考《安徽金石略》卷三。还有一个 1368 年的碑文，证明著名的赛典赤 (Sayyid-Ajall) 曾在云南兴复一个佛寺 (参考 Vissière 撰《汉回研究》13 页)。

② 现在蒙古的读法，其音很同 dzān 相近，蒙古文则作 dzaghan (jaghan)。案今日蒙古语中有同一字而有 y 同 j (等于法语之 dj，尤近于近代读法之 dz) 之两种发声者，这种发声就是畏吾儿字之 y 发声，可是在突厥、蒙古语中常与古之 y 相合。蒙古时代汉语的译法，以蒙古语训为“成吉思汗法令”之 jasa 或 jasakh (突厥语作 yasaq) 为“札撒”，译蒙古语训为断事官之 jarghuči (突厥语作 yarghuči) 为“札鲁忽赤” (上一译名见《元史》卷二，卷五，后一译名见《元史》卷十八)。由是可以证明自此时始，有不少“畏吾儿字”用 y 发声之字，在蒙古语中皆读作 j。还有一个更较显明之例可以引证：案突厥语之 yam，此言道路驿站，在蒙古语中则作 jam，俄国语曾借用此字之常训，而用 y 发声者。然汉语则取 j 发声，而译蒙古语之 jamči (此言译长) 作站赤。这个经汉语译写蒙古名称所用之站字，现在尚在汉语车站之站字中存在。安南语读若 tram，则有邮递之意。沙畹所提出的 eltšin 的解释 (见 1904 年刊《通报》389 页、397 页)，当然是不对的。至若 Giles《字典》(第二版 270 条) 所著录之 janji 亦误。又若布洛赛以为突厥语之 yam 乃是出于汉语驿马驿务参合而成之说 (刺失德丁《蒙古史》第 2 册 311 页)，更无足取。可是根据《元史》中译 yaghan/jaghan 作“牙罕”之例，似乎可以证明由 y 转为 j 之变化，仅在 14 世纪后始见普及。取后此所言之明代汉、回字书亦写作“牙罕”之例，可以参证此说也。复次《元史》卷十二于 1282 年下著录有一“也罕的斤”，布洛赛 (同上引文 495 页) 以其对音是 Yaghan-tégin，而释其意为“红王”。案 yagha 或 yaghan 固亦训为朱砂，可是此意已久废不用。在此处我以为也可以还原作 Yaghan-tāgin，而释其意为“象王”。可是此人是突厥臣刺鲁 (Qarluq) 种人 (《元史》卷一三三)，并无有用蒙古语解释其名之必要。Radlov 之《字典》著录阿勒台 (Altai) 诸方言中之“象”，作 yān 同 yān tāgān aḥ，后一名未详所自来也。尚应参照蒙古语之 jorci-khu，其意犹言“行”、“旅行”，此字必与突厥语之 yoryt-māq 有关系。其在 1314 年普颜都汗 (Buyantu-khan 仁宗) 圣旨碑 (钧案即陕西盩厔大重阳万寿宫圣旨碑) 中，尚用八思巴字母写作 yorci-khu。

而在 13 世纪时，在两种语言之中发生一种不同的变化，而成为突厥、蒙古语中的对似字者也。^① 各人可以在其所处之地带，同他所操的习近之语言，自由采用之。我以为对于这件问题可以作一种有系统的研究，或者因此可能将十三四世纪突厥人同蒙古人的固有名称之使人迷离不明的变则，至少可以得一部分之了解。^②

① 明代四夷馆所辑的汉、回字书，曾将这些对用字间接保存。这些字固然是以突厥语对汉语，可是元亡未久，字书中常将其痕迹保存。所以 Klaproth 曾经根据柏林所保存的此类字书，将“象”字还原作 yanga。其首先发现此字者，要为 Müller（参考所撰《回纥考》第一册 59 页）。Denison Ross 曾在伦敦大学 Morrison 藏书中发现这类字书之若干别本。承他见爱，将汉、回字书转抄给我参考，我在其中所见的“象”字对译，并不是 yanga，乃是“牙罕”，而此“牙罕”只能对蒙古语之 yaghan 也。这是“养阿沙”与“牙罕汗”两种写法并存之一很好的举例。

② 还有对于成吉思汗长子名称之一相类的解释，可是其说似很可疑，所以我不能不在附注中详加解说。《元史》名此人曰术赤，案蒙古时代之“术”字，尚读若 Ju，这就是十三四世纪他的正例的对音。比方译 Juhud（即犹太人）作“术忽”，就是一例。如此看来，汉语的“术赤”之通常对音应是 Juci。《元朝秘史》皆作“拙赤”，则对 Joçi。刺失德丁的写法当然可以说是 Juci，也可说是 Joçi。撒难薛禅写法也是一样。又一方面最古的著作，是宋人孟珙在 1221 年成吉思汗在世之时所撰的《蒙鞑备录》，他写此名作“约直”，则对 Yoçi。又考 Erdmann（Temudschin der Unerschütterliche, Leipzig, 1862, p. 641）所辑关于 Juci 或 Joçi 的几种伊斯兰教撰述的解释，好像其中明言的或隐喻的意义是“客”，由是有人承认成吉思汗长子名称所本的，就是蒙古语之 jočin，此亦言“客”。至若其收声之-n，在十三四世纪蒙古字中是很容易出现或消灭的（比方按陈 elcin 之对按赤 elci，答鲁合臣 darughacin 之对达鲁花赤 darughaci，合申 khasin 之对汉名河西之类），不足为这种解释的障碍。看孟珙的“约直”的写法，连同前此所说的 yaghan jaghan，尤足证明 13 世纪时 y 之转为 j 之变化，不及今日之普及，关于 Yoçi-Joçi 之解说如此。至若《刺失德丁书》中之 Joçi (juci)，在他以前的撰述家术外尼（Juwaini）所撰的《世界侵略者传》（Tarikh-ijihan kušai）中，则常写作 Tuši（或 Toši）（可检 Gibb Memorial Fund 所刊行的《术外尼书之索引》），这种写法好像可用西方撰述来互证。普兰迦儿宾两次著录成吉思汗长子的名称，而名之曰 Thossuccan，这种写法未曾经人说明。Bretschneider（《中世纪考证》第 15 页）仅说“显是抄写之误”，我以为根据术外尼的写法，似乎不能作此简单的解释。根据普兰迦儿宾本人之说，can 就是汗（与可汗相混言），好像 Thossuc 末尾之 c（有若干抄本作 Thossut，疑非），是从此名后面的 can 发生的。如此看来，Thossuc-can 同《术外尼书》的 Tuši（Toši）很相近。术外尼所著录之名称，有时表现很有关系之特点。比方成吉思汗的少子拖雷，在《刺失德丁书》同《元史》中皆作 Tului 者，而在《术外尼书》中则作 Tuli（Toli），与伊斯兰教撰述“镜”的解说很接近，因为蒙古语即名镜曰 toli 也。这种解说之价值，我不敢保其必是，我对于用 jočin 解释 Juci 或 Joçi 之说，亦不能保其为真。（还有他人用相同之名者，如成吉思汗的兄弟 Juci-khasar 或 Joçi-khasar，同《元史》卷一二〇有传之术赤台 Jucitai 或 Joçitai）。可是只要有两种毫无关系的史料，在 Juci 以外著录有 Tuši 的写法，即须强使我们承认在此处也有一名两写之例。顾普兰迦儿宾即于 1246 年在哈刺和林附近记录这个 Thossuc-can 名称，质言之，在术外尼写作 Tuši（Toši）而在后来几年本人也曾旅行之同一地域之内，由是可以寻究此处是否为突厥、蒙古语之一种对称？术外尼是否在《刺失德丁书》之蒙古语名 Joçi 以外，别用一种突厥语之 Tuši 写法？（或者与 tuš 不无关系，此字犹言伴侣。）如同他保存普兰迦儿宾、鲁不鲁乞在哈刺和林所听见的突厥语名 Mängü，而《刺失德丁书》则采用蒙古语名 Mönka（Möngkä 的例子一样）？

荨麻林

见《亚洲报》1927年刊下册261至279页

伯希和 撰

刺失德丁 (Rašidu-'d-Din) 曾记述忽必烈 (Khubilai) 时代从大都 (今北平) 赴开平府 (或上都, 在北京西北约二百四十公里) 之路有三。并说第二路经过一城名曰Joju, “在此城附近别有一城名曰Simāli, 此城居民多是撒麻耳干 (Samarqand) 人, 曾仿撒麻耳干种植不少园林。”^①

刺失德丁之文, 先在1831年, 曾经汉迈尔 (Von Hammer) 根据维也纳 (Vienne) 的一部写本翻译, 而在巴黎《地理学会会刊》中刊布 (第89号, 1831年6月刊第265等页), 旋由克刺卜洛特 (Klaproth) 根据巴黎诸写本译载于1833年《亚洲报》中 (单行本16至17页)。玉耳 (Yule) 曾在其《契丹路程》 (Cathay) 中转录克刺卜洛特的译文 (Cordier本第三册116至117页)。最后布洛赛在其《蒙古史》中刊布了一本附带笺注的波斯原文本 (第二册463页)。克刺卜洛特、玉耳、布洛赛皆说Joju即是涿州。此说显误, 因为从大都到上都竟可说径向北行, 不能假道地在大都西南七十公里的涿州。玉耳之所以误会者, 盖因音之相类, 又因马可波罗 (Marco Polo) 曾

① 参考布洛赛 (Blochet)《蒙古史》第2册463页。

言涿州 (Juju) 是两条大路分路之处 (Yulecordier 本《马可波罗行纪》第二册 10 至 12 页)。可是马可波罗曾明说在涿州分道之两道, 一道西行赴山西而通中亚; 一道南行赴中国南部, 则不能说涿州在大都至上都通道之间。

布莱慈奈德 (Bretschneider) 曾在他所撰的《北京及其附近之考古的及历史的寻究》(法文译本 93 至 96 页) 之中, 对此已有辩正。玉耳之《契丹路程》, 是在 1866 年刊行, 其《马可波罗行纪》(第二版) 是在 1874 年刊行, 不能利用布莱慈奈德在 1876 年出版之书, 固无足异。可是后来 Cordier 在 1914 年同 1903 年的补订本中, 同布洛赛在 1911 年的笺注中, 皆未引证此书, 则未免可异。暂时固不言 Joju 确为何地, 我们先要知道, 按照刺失德丁的记载, 上都建设以前, 忽必烈避暑之所 (yailaq) 就在 Joju 属境以内。则好像是说 Joju 在长城附近, 而不在涿州所在的中国本部之中。尤其是从大都赴上都经过 Joju 的第二道, 乃循 Sangin 河行, 此河就是桑乾河, 也就是现在的浑河。从张家口之西南, 流经北平之西, 东南流至天津, 如此看来, Joju 应在北平之西北。

况且我们对于 Simali 城有一可考之点: 刺失德丁说此城在 Joju 附近, 布洛赛曾假定此城的对音是“西八里”, 可是从来未有此类城名。布莱慈奈德在他以前早经说过, 此 Simali 只能是现在的洗马林, 此地就在长城之内, 张家口之西约三十余公里。布莱慈奈德又曾将此现代的名称同《元史》(卷九四) 所著录的寻麻林名称供比对。我现在不能说我将著录此名之蒙古时代的史文完全裒辑, 兹仅略引数条, 以供阐明 Simali 同寻麻林的问题之用, 其文如下:

(一) 《元史》卷十九《成宗本纪》云: “大德二年五月辛卯 (1298 年 6 月 15 日), 罢荨麻林酒税羨余。”

(二)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云: “兴和路寻麻林人匠提举司, 提举一员, 同提举一员, 副提举一员, 照略案牍一员。”

(三)《元史》卷一二二《哈散纳传》云：“哈散纳，^①怯烈亦(Käräit, Kerait)氏，太祖(成吉思汗)时从征王罕(Ong-khan)^②有功，命同饮班朱尼(Baljuna)河之水，且曰：‘与我共饮此水者，世为我用。’^③后管领阿儿浑(Argun)^④军，从太祖征西域，^⑤下薛迷则干(Semizkant, Samarkand)、^⑥不花刺(Bukhara)等城。至太宗(窝阔台 Ögödaï, 1229—1241)时，仍命领阿儿浑军，并回回(伊斯兰教徒)人匠三千户，驻于荨麻林。寻授平阳、太原两路达鲁花赤(darugači)，兼管诸色^⑦人匠，后以疾卒。子捏古伯^⑧袭，从宪宗

① 原名未详，并未见蒙古时代别有人有此名称。理论上的还原，应是 Qasana 或 Qasanaq，迁就可说是 Hasana (Asāna) 或 Hasanaq (Asanaq)。其人既然是怯烈部人，也可令人想到一种基督教名称，可是其后裔并无一人确用基督教名者。

② 此怯烈人从成吉思汗征王罕，其事可异。因为王罕即是怯烈部长，但在事实上，好像已有若干怯烈部人参加成吉思汗诸战役者。Jean du Plan Carpin 在 1246 年，所见窝阔台的丞相镇海(Činqai)，即是一怯烈部人。

③ 关于成吉思汗攻击王罕之此种有名的传说者，可参考多桑(d'Ohsson)《蒙古史》第一册 71 至 72 页，又 Palladius 之文，见北京《俄国传教会丛刊》第四册 210 至 212 页，此种传说有一故事性质，其事不见 1240 年的《元朝秘史》著录，世人且不知此 Baljuna 名称究何所指。此“巴瀚渚纳”在《元朝秘史》第 182 至 183 则所指者，乃是一湖(na'nr, nör)，并非 13 世纪末年以后中国载籍所言之一河流。

④ 蒙古时代的中国载籍常言有此阿儿浑军。阿儿浑(Argun)是一部落名称，必与 11 世纪末年 Kašgari 所已识之 Arġu 部落，同现代的“黑姓乞儿吉思”(Kara-Kirghiz)之 Arġin 或 Argun 族有关系。我想马可波罗所言之 Argon 杂种人，或亦指此。马可波罗说此 Argon 就是地中海东岸所指之杂种人曰 Guasmoul (或 Basmoul) 者。此名好像即从古突厥部落 Basmil (拔悉弥)一名所转出。现在 Argon 一名固指 Ladakh 之若干佛教杂种人，可是马可波罗所指者仅为伊斯兰教杂种人，而恰在经过哈散纳管领阿儿浑军并回回人匠三千户之荨麻林地方。说到此种人，我并以为波斯的蒙古汗阿鲁浑(Argun)的名称亦本于此。蒙古时代有不少人曾用一个部落名称作人名(而且常非本部之名)。

⑤ 所指者乃是 1219 至 1223 年成吉思汗远征之役。

⑥ 干原误作于，昔日撒麻耳干所用 Semizkant 的名称(此言肥城)，曾见中世纪中国载籍阿美尼亚(Arménie)及西方撰述所著录，Bābur 曾在其“记述”之中，说是突厥人同蒙古人习用之称。

⑦ 诸色犹言种种名色，此语在蒙古时代以前早已有之，是为蒙古时代色目一名之所本。色目者，蒙古人以外之种种名色之人也。

⑧ 伯字在蒙古时代应如今之白、百等字，读若 pai。然其译写的对音常为 bai 或 bāi，则捏古伯之对音应是 Negübāi 或 Negbāi。此人应与察合台(Čaġatai)之孙同名，世人大致将其名写作 Nikpāi。然“捏”字假定对 ne-，无呼音之“古”字大致对 gū-或 g-，准此例以推，则应读若 Negbāi，而不应读若 Nikbāi。汪辉祖之《三史同名录》(卷三一)谓《元史》中名称“捏古伯”者有五人。

(蒙哥 Mongka)攻钓鱼山^①有功，以疾卒。子撒的迷失^②袭。撒的迷失卒，子木八剌^③袭，充贵赤^④千户，迁西域亲军副都指挥使，大德元年(1297)卒。弟秃满答^⑤袭。秃满答卒，子哈刺章(Qarajang)^⑥袭。”^⑦

(四) 欧洲人所认识之郭守敬(1231至1316)，只知其为一历数家，然其人亦为一水利家。他在忽必烈时代，治理水道河渠颇著功绩。《元史》(卷一六四)列传有云：“至元二十八年(1291)，有言滦河自永平挽舟逾山而上，可至开平(上都)；有言泸沟自麻峪可至寻麻林。朝廷遣守敬相视，滦河既不可行，泸沟舟亦不通，守敬因陈水利十有一事。”

案滦河即是发源于开平境内流经永平注入渤海之河流。至若泸沟，即是桑乾河或浑河之别名。今日北京西方之泸沟桥尚存其旧称，此桥即是马可波罗之桑乾桥(Pul-i Sangin)。准是以观，寻麻林应在此河之上流，是亦今日此河支流二道河东十公里洗马林所在之处。

(五) 元《典章》，成于1331年者也。其卷七官制门、从五品内

① 钓鱼山在四川境内，盖指1259年蒙哥汗围攻合州之役。蒙哥汗即死于此地。

② 汪辉祖《三史同名录》(卷二九)以为《元史》同此名者七人，其原名显有突厥语分词之-miš。根据译例，第二缀音应为-d，然其为sat-(此言卖)转出之名无疑。盖在若干突厥方言中，亦有用-d者。例如应作satigh者，乃作sadigh(此言商业)。应作satighci者，乃作sadighci(此言商人，见明代《华夷译语》之汉、回译语)。则此“撒的迷失”必为等若Satilmış之Sadilmış无疑。此名应亦为刺失德丁时代在波斯之Bargut Satālmış的名称正当写法(参考Berezin, Trudy, OIRAO, V, 86)。Satilmış犹言“已卖者”。

③ “木八剌”大致为Mubarak之译名，此言“被佑者”。此闪语(sémitique)名称，基督教徒同伊斯兰教徒并曾用之。

④ “贵赤”或“贵由赤”乃是güikci或güyükci(字根是güyü-或güi-, 此言奔驰)，《马可波罗行纪》中误写之cunichi应即指此。

⑤ 此名他处并见著录，似对Tumandar，即Tümändär之别写。

⑥ 哈刺章乃云南境内的部落名称，此处则用作人名。汪辉祖(《三史同名录》卷三五)谓《元史》中有名哈刺章者八人。

⑦ 此传是在1369年所修，似是本于14世纪初年的私人家传或墓志，或者原文尚见元人文集，然我未曾检出。钱大昕(1728至1804)之《元史氏族表》，对于此人除转录《元史》外，无他发明。然无论如何，设其所本者是一私人传志，则有下述两种结果：观其中言及班朱尼河的故事，不能谓其为信史，而且家传所言之事续，常有增饰之文，应该加以鉴别。

有荨麻林人匠提举，又从七品内有荨麻林纳失失^①局大使，又从八品内，有荨麻林纳失失副使。

案上引诸文之地名，有“荨麻林”同“寻麻林”的两种写法，我对于头一字皆读作寻，《康熙字典》固谓荨字读若谭，然又谓荨亦作蕁，而后一字亦读作寻。考“荨麻林”一名之意，犹言荨麻之林，荨麻者，乃 *urtica thunbergiana* 之汉名，别有荨麻树，乃为榎树 (*micocoulier*) 之称（安照 Taranzano 神甫之说）。布莱慈奈德在《中国植物》中未录此名，Smith (*Materia medica*, 452) 只知有荨麻，而读若谭麻。Taranzano 神甫在其《法汉科学字汇》(*ortie & micocoulier* 条下) 同《科学字汇》第二册 582 页及 596 页中，对于谭麻同寻麻的读法，踌躇未决。Hemeling 之《英汉字典》(*nettle* 条)

① 此处原作纳尖尖，显误，因为别二条皆作纳失失。此名常见蒙古时代载籍著录，有亦作纳失失者，有作纳石失者，偶亦有作纳失思者。中世纪之西方著作家，常言有织物名曰 *nacchi* 及 *nachetti* (是为 Pegolotti 之写法)。前一名，世人久已识为一种金锦之称，而适应波斯语之 *naḥ*。后一名必为汉译之纳失失，质言之，一种金丝织物，惟颇难使此二名读法相适应。De Groot 《中国宗教制》第三册 1421 页) 曾为纳失失必为波斯语 *naḥ* 缩写词 *naḥcek* 之讹译 (= *naḥ* 之缩写词 *naḥcaḥ*)，然此说非是。案拉丁语写此字作 *nasicius*，而与波斯语之 *nasiz* (= *nasij*?)，同突厥语之 *našic* (= *našic*) 相适应。Ibn Baṭṭūṭah (第二册 423 页) 以阿剌伯语 (Arabe) 写作 *nasij*，刺失德丁 (布洛赛本第二册 73 页) 以波斯语亦写作 *nasij*。Vullers (第二册 1324 页) 曾著录有波斯语之 *našic* 写法，以其本于阿剌伯语之 *nasij*。则此字无论出于波斯语抑出于阿剌伯语应以 *nasij* 写法为起点。案中世纪之诸抄本中，常将 *c* 同 *t* 两字混写，颇难辨《马可波罗行纪》中之 *nasici* 或 *nasiti* 何者为是。而 Pegolotti 之 *nachet i* 同 Gênes 《港关税表》上之 *nascitorum* 第三缀音声母，是否确为 *t*，亦颇难言。尚有 *nachiz* 写法，似可适应一种 *j* 收声，与突厥语之 *nasiz* 写法相合。至若突厥、蒙古语，似曾有两名并用之例。考《元朝秘史》第二七四则，除著录 *naq* (等若波斯语之 *naḥ*) 之复数 *naqut* (纳忽惕) 外，并著录有 *načidut* (纳赤都惕)，此字确必适应波斯语之 *nasij*。至若由 *-si* 转为 *-ci* 者，则应知蒙古时代之蒙古语读法，*i* 前之 *s* 不读作 *s*，而读作 *š*，由是 *nasij* 成为 *našij*。又一方面蒙古语 (突厥语亦然) 常有不少 *s* 或 *š* 与 *č* 互用之例，则 *načidut* 得为 *našidut* (<*nasidut*) 的并用之称。至若 *načidut* 之字尾，初视之，似为 *načit* 之复数，由是可以其与西方写法之 *nachetti*, *nascitorum* 等写法相比对 (假定西方写法不误而言)。顾突厥语之写法，同汉译蒙古语之纳失失，皆不容有齿音收声。兹可作别一解释：案蒙古语曾著录有两重复数之写法，《元朝秘史》第二七四则谓孛名 *qačidut* (合赤都惕)，此 *-ut* 必为 *qačit* 之复数，而此 *qačit* 又为 *qačir* 之第一复数。案在突厥语中，亦谓孛名 *qatir* 或 *qačir*，由是我以为 *načit* 如同 *načis* < *načic* < *našic* 或 *našic* < 波斯语 *našis* 之复数。至若汉译之纳失失，对音应作 *našis*，是即 *nasij*。案照蒙古语声母变化之写法，而其所本者乃为 *nasij*。盖在蒙古语中 *i* 前之 *s* 应变为 *š*，而蒙古语又不容有 *č* 收声，尤不容有 *j* 收声。则 *-š* 收声在蒙古语中大致变为 *-s*，所以汉译读音成为纳失失 (*našis*)。